

新芽沙龙·第9期

孔子学院在爱丁堡大学和英国

2019年10月22日

10月22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燕南园66号院举办了第九期新芽沙龙。爱丁堡大学苏格兰孔子学院的创始人 Natascha Gentz 教授以“孔子学院在爱丁堡大学和英国”为题，介绍爱丁堡大学开办孔子学院的动因以及他们如何在大学中经营孔子学院，并从英国的视角阐释了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等其他文化学院的不同之处。

据 Gentz 教授介绍，1965年爱丁堡大学设立中国研究系，相较于英国和欧洲其他中国研究系时间相对较晚。2006年，爱丁堡大学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小型的代表处办公室，并于同年开设了孔子学院，这也成为爱丁堡大学一个颇负盛名的项目。爱丁堡大学的校长十分支持孔子学院的项目，积极参与到学院活动中。

2006年孔子学院刚成立时，爱丁堡大学与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五所中国大学签署了谅解备忘录（MOUs）。到目前为止，爱丁堡大学已经和50所中国大学签订了不同级别的谅解备忘录（MOUs）。在该大学的对华战略里，有一部分是向其员工提供有关中国和中国研究项目的培训，他们希望借此加深学校对中国的了解，并促进与中国及中国大学的互动。此外，孔子学院还在苏格兰社区举办相关会议、研讨会、外展服务以及公众参与活动，还为该大学的学者提供学术培训，

借此在更广范围内提高人们对中国重要性的认识。

在研究方面，爱丁堡大学主要致力于产出卓越的研究成果，并为这些成果创造资金支持的机会。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它旨在增强文化之间的对话、联系和理解，同时在教育方法上进行创新，以此培训人们并促进他们与中国的互动，从而更好地激发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在提高社区成员参与度以及促进合作的战略中，孔子学院通过举办节日活动和社区活动的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爱丁堡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开设了暑期艺术学校项目，参加该项目的每个学生都能前往爱丁堡大学进行为期一周左右的活动。学生们可以参与爱丁堡艺术节，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参加一系列的讲座，学校还会举办校友讲座等活动促进与中国有关的教育。

早期孔子学院的体系很小，对大家来说一切事物都很新鲜，甚至没有明确的组织架构或章程，但是现在，英国有 30 所孔子学院，是欧洲密度最高的国家。自 2005 年以来，英国已经拥有 150 个孔子课堂，它们通过与学校合作来促进汉语教学。爱丁堡大学主要与社区而不是学校合作，因此课程多在晚上进行。这些背景各异的学生大多是出于各种原因来学中文的成年人，只有少部分是大学生。

随着英国孔子学院数量的不断增长，它们也逐渐走向多样化和专业化。伦敦拥有 7 家孔子学院，每个学院都积极发掘自身独特的优势吸引不同类型的学生。伦敦政经学院（LSE）开设了商务孔子学院，金史密斯学院的孔子班专注于表演，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OAS）设立的课堂主推教师培训，此外还有一个关于传统中医的孔子学院。在爱丁堡大

学建立孔子学院时，专业化发展对它来说没有什么必要性，所以学校就建立了一个涵盖教育、商务和文化领域的综合性孔子学院。爱丁堡大学认为这三方面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它试图发挥这三个领域的协同作用，以此作为促进人们与中国交流的一项策略。

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的总体战略是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是什么力量塑造了当今中国，并试图理解这个国家为何采用这种发展模式。学院鼓励大家与中国的积极交往，并强调这些交往的益处以及它所能带给学习者职业生涯的影响，同时帮助人们之间的对话和思想交流顺利进行。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最高的目标——促成中英之间可持续的联系与协作，并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伙伴关系。

Gentz 教授认为，与其他国家文化机构（例如歌德学院或英国文化协会）相比，孔子学院的项目是非常有趣的。歌德学院是独立的德国文化机构，而孔子学院是跨文化机构。虽然这是个非常好的想法，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孔子学院事实上是中国大学和海外大学之间的一种合作。爱丁堡大学的合作伙伴是复旦大学，它们之间的合作联系由一个顾问委员会统筹管理，该委员会的成员分别来自中国政府机关、总领事馆、驻伦敦使馆的教育部门、苏格兰政府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一些社会机构。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由孔子学院的员工向委员会进行汇报，委员会提供相应的反馈，员工们商讨接下来的发展策略。除此之外，孔子学院还另设有董事会，成员包括学院院长及教务主任 Gentz 教授，她同时也负责学院的财务管理。

Gentz 教授谈到，尽管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只是一个小团队，但是他们希望能组织一些大型活动，因此他们会与整个孔子学院体系还有其他合作伙伴一起筹划。例如，它会与复旦大学、北京电影学院、格拉斯哥大学和阿伯丁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一起组织活动。孔子学院还与政府部门合作，不仅吸收了政府人员加入孔子学院董事会，还与他们共同制定对华交流与访华准备的方案。另外，孔子学院还会与英国文化协会等社会组织合作。

爱丁堡大学的孔子学院开设了教育、商务以及文化项目。虽然孔子学院最初的建立是为了语言教学，但语言学习只是其中占比很小的活动。孔子学院还会邀请资深商业领导们来开展一系列商业讲座，这些讲座并不只是涉及经济意义上的业务内容，还会从嘉宾的角度谈论如何与中国交流互动。近三年来，孔子学院还组织了“一带一路”的年度会议，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推动“一带一路”的发展，而是为了提高大家对它的认知。孔子学院还与政府以及爱丁堡大学的校长一起合作，该校新任校长正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每周都会去上课。孔子学院还为其他客户提供文化简报以及培训、翻译服务和相关建议。针对一些想认真学习汉语的人，孔子学院会提供简单的中文课，包括学习中文名字的发音，此外还与一些公司共同开设定期的一对一语言课程。孔子学院还会与中国高校组织大型文化活动，如中国电影节，有关中国的纪实摄影展，邀请中国高校前来演出等。

总体而言，孔子学院在运作上有一定的自由性和局限性，因为它代表了中国，且具有一定外交地位。在这方面它和其

他一些文化机构有相似之处，比如英国文化协会或歌德学院，这两个纯粹就是国家机构。与此同时，它的这种特性也饱受争议。这种机构通常展示一个国家的良好与正面形象，那么把它安置在大学中是否合适呢？孔子学院的工作人员认为，就中国问题应进行批判性辩论而不能仅仅展示其正面形象，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来说，这也是英国对待事物的态度。如果大家去看英国报纸，不论对于什么事物，你们都不会只看到千篇一律的正面报道。Gentz 教授认为，大家必须用不同的视角来分析，这样才可以从正反两面看待各种问题，从而解释以某种方式去做事的原因。如若不然，孔子学院就很难吸引大众。孔子学院的局限与不足引来了一些负面报道，这样的报道在英国并不多，但在美国却比较多，这些媒体并不了解英国的孔子学院是如何运作的。英美两国的运作方式有所不同。他们提出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宣传机构。Gentz 教授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与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协会相比，孔子学院所拥有的资源非常有限。后两者是成立了几十年的机构，且资金雄厚，孔子学院则是由一些短期工作的人员管理，人员流动频繁，他们也没有受过文化管理方面的培训。另外，可持续性也是一个问题。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孔子学院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项目。孔子学院每年都要与国家汉办进行筹划，学院的实际工作以及预算内能做的事情每年都会发生变化。这是一种相当平稳且可预测的发展态势。孔子学院的员工不喜欢中国政府加大对微观层面事务的管理。尽管团队规模很小，但他们却希望在国家平台上起到类似于其他研究所的作用。这其实

难度很大。

讲座结束后，Gentz 教授与现场师生进行了交流讨论。

提问:您提到，孔子学院与英国当地政府以及中国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所以请问，英国地方政府是否有可能将孔子学院视为对当地文化的某种威胁，或者说担心孔子学院正在对那里的学生施加以某种中国价值观？

Gentz:在我看来，这对当地政府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孔子学院只是一个宣传母国语言的机构，这种现象在国际上很正常。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它设立于大学中。孔子学院虽然没有过多地灌输价值观，但却限制了学术自由，因为有些话题无法在这里进行讨论。不过，这对于英国的孔子学院来说通常不是什么问题。与美国的操作方式不同，我们除了有孔子学院之外还设立了中国研究系。因此，中国研究系作为学术部门，主要进行研究和学术会议，而孔子学院则负责外展服务和知识交流部分。我认为人们所怀疑的是我们是否会教书，孔子学院有时会代替中国研究系，所有的中文学习都由国家汉办的老师教授。这对于大学来说当然是个问题，因为他们持有不同的视角且受到的是不同的教育。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个威胁或者说是在过多灌地输中国文化。

提问:请问您如何理解区域研究与孔子研究之间的区别？另外，根据您的理解，一个懂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人是否算是中国方面的专家？

Prof. Gentz:当我刚到爱丁堡大学时，汉语学习主要与文学和文化相关。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阅读汉语课文、翻译和朗读有关历史的古文和现代文，但这并不是我们对中国研究

的理解，因为我们想把中国研究当成一种区域研究来学习。我们共有八九名学者，他们分别负责不同领域的教学，因此学生们可以在许多主题中自由选择。中国研究教学难度大，没人会选择主修它。但是在这门学科内，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其中的门类，还有许多学生选择将其作为一个联合学位。因此，你所提到的文学和文化专家是我们二三十年前所培养的人。我们认为区域研究中需要有基于语言的研究，了解当地的语言仍然很重要。例如，如果一个研究德国政治学的英国学者却不会讲德语，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对于中国，有些学者尽管不懂某种语言，却仍然认为他们可以进行相关的写作，或者解释正在发生的相关的事情。我不认为这种情况能够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基于语言的区域研究。不过这些和孔子学院都没有关系，因为孔子学院并不做学术研究，我们只是开展语言教学。我们曾经确实开展过讲授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课程，但是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因为人们并不感兴趣。我认为，一旦你涉及到这个层面的学习，这就是大学内学习的内容了。中国政治并不是人们在网上课程中会选择学习的内容，因此所有这些区域研究都只是在中國研究系开展。

提问：我们知道爱丁堡大学的孔子学院会和许多组织合作并且拥有很多合作伙伴。在我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中，作者认为有些孔子学院在资金和教学设施上面临一些困难。不过这种情况似乎在爱丁堡大学的孔子学院中并不存在，您能否介绍一下它是如何维持运转的呢？

Prof. Gentz: 我们确实由于资源有限而面临一些问题，

但我们有一支非常热心的敬业团队。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们都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八至十年，我们共同建立了孔子学院。刚开始时，没有人知道孔子学院应该是怎样的，于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建立了整体架构并且一起讨论想要开展的项目。我们是唯一一家连续获得国家汉办和其他国际机构 10 项奖项的孔子学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部门机构，其运作水平也各不相同。另一方面，从一开始我们就得到了学校非常积极的支持。我认为这是英国特有的。如您刚才提到，英国的孔子学院比其他地方多得多。由此我认为英国人民对于孔子学院有着很积极的态度，并且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方法。他们相信，比起批评，参与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首先，英国的少数群体，例如英国华人，会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吗？其次，我学习俄语已有 50 天了，我发现学习第二语言非常困难。众所周知，汉语是一门很难学习的语言。所以我想知道英国学生如何学习汉语？

Prof. Gentz:我们并没有太多这样的学生。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华裔学生，他们没有从父母那里学习中文。但通常来说，在英国长大的华裔人士从小会去周末学校学习汉语、汉字和中国文化，因为中国父母们希望孩子们早点学习汉语。而我们不能在孔子学院给小孩上课，这是不被允许的。

我跟人们解释说汉语并不是一门很难的语言。与英语十分相似，汉语在刚开始学的时候也很简单。我指的不是写作，仅仅是这门语言。因为语法简单，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学句子非常快。要讲好中文是非常难的，这点也和英语一样。如果

你想很得体地说这门语言，那就很难了。我认为其他语言更加困难，因为它们语法复杂，在学习之前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理解语法。但是当你懂得语法之后，它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提问:我来自爱丁堡，我认为苏格兰是一个相当同质化的社会——白人占 95%。但是我参加了伦敦的孔子学院，他们的课堂比较混杂。他们的学生来自各个国家，有些人的父母来自中国大陆，还有来自香港而不会说普通话的学生在那里学习汉语。孔子学院如何衡量他们的成功程度？

Prof. Gentz:我们的报告是定量的，必须汇报学生、课堂以及活动的数量，还有观众、会议等的数量，这都是一些表格和数据库。如果你只是关注数字，那并不能说明太多东西，但这些并不能表明这个项目的质量。我能问个问题吗？在中国，大家对孔子学院是什么看法？我可以想象，会有一些人批评政府花那么多钱去教全世界人中文，在中国还有很多地区教育落后的情况下，还把钱给了许多国外的大学。公众对我们在做什么以及我们做的事是否正确有什么看法？

钱乘旦:我知道政府在国外花了很多钱，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

Prof. Gentz:我也相信这是值得的。它最终会以金钱的形式回馈中国，因为会有更多人会了解中国、学习汉语并与中国进行互动。这对于经济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

钱乘旦:有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政府把那么多钱花在一些国人完全不了解的国外项目上。有些人会说我们自己

需要这些钱。是的，这是事实。据我所知，有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但对于我来说，我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它让全世界更多人了解中国是怎样的国家。

Prof. Gentz: 你很了解英国。但是当你想到有多少中国人了解英国或者西方世界，又有多少英国人了解中国，这两者的失衡让人难以置信。英国人知道的太少了，除了与英国有关的东西，他们很少教其他内容。对于历史，他们只教英国历史和一点点全球史。相比于中国的重要性和它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研究相关的教学规模少得可怜。这种状况正在慢慢改善，但是还有许多困难。

钱乘旦: 并且，我们这一代人还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外国政府为了让中国人民了解他们而在中国花费资金。例如，德国政府就花了很多钱让中国人对德国有了了解。日本政府也在中国花了不少钱。美国政府将大部分国外预算用于使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情况。

Prof. Gentz: 没错，确实如此。当时歌德学院选择邓小平作为年度人物，并在中国开设了歌德学院。

王锁劳: 国庆节期间，我去以色列旅游了一个星期。我当时去了以色列哭墙，并且拍了很多张犹太人的照片。那些戴着黑帽子，穿着长袍并且留着长胡须的人们使我们立即会想到犹太人的形象。然而，这些人并没有工作或者参军，他们只是整天读经。当我把照片发给我的朋友看时，朋友说，“所有犹太人都是这样的”。但我说不是的，这样的人只占总人口的 10%。在每个国家，都必须有人尝试做一些典型的、象征其文化的事情。也许从这方面来说，中国功夫和孔子的

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Prof. Gentz:我认为传统文化的学习非常重要。我们在大学里教学生们古典汉语。我认为如果你不了解传统的中国和历史，你是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的。我们开展了一场名为“多面孔子”的会议，在会上讨论儒学的不同方法以及孔子传记的不同叙述方式。我们还有一个名为“中国不同时期手稿阅读”的会议。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些活动要以合理的方式开展，而且人们无论讲授什么都必须先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和专业能力。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传统文化的。你可以在这里教传统文化，但是这个课程应该由真正懂行的人去开展。这样人们才能看到其中的价值。在格拉斯哥有一些非常贫困的地区，那里的孩子都没上过大学。我们也希望能让他们学习汉语，而这是一个挑战，但功夫课程对他们是非常适用的。这样你就可以用中文来教他们功夫，这种方式也能让他们参与到汉语学习中。

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王锁劳副教授在会议总结时表示，Gentz 教授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的许多有益且深刻的印象。从他的理解来看，这是典型的区域研究。这场讲座以爱丁堡和英国的案例为重点，在这一点上它很好地达到了在北京大学甚至整个中国培训区域研究的目的。

新芽沙龙·第13期

后苏联时期中亚的地区构建及其中国认知转型

2020年5月19日

中亚五国作为苏联解体后的新独立国家，面临着民族构建、国家构建和地区构建三重战略任务。中亚国家曾试图同步推进上述进程，但相对于民族和国家构建，中亚国家间的地区合作几次受挫，直至米尔济约耶夫出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才出现转机。作为中亚地区的重要“外部他者”，中国直接嵌入了五国形塑地区认同的历史进程。伴随着“西部大开发”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中国在中亚的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而中亚对中国的认知也在渐趋复杂，这构成了中国和中亚跨文化交际的关键因素。

5月19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第13期新芽沙龙，邀请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杨成教授围绕“后苏联时期中亚的地区构建及其中国认知转型”主题进行学术讲座，沙龙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琦教授主持。

一、地区构建问题

杨成教授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相较于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地区构建问题是容易被忽视的，但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中，地区政治的意义越发凸显，美国学者卡赞斯坦在《地区构成的世界》中提出的“多孔化地区”正成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重要特点。

在地区转向的影响下，每个大国都倾向于掌控自己所在地区的事务，巩固自己所在地区的领导权，确立自己所在地区的国际秩序。因此，未来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由多地区组成的多秩序世界，在这个多秩序的世界里，每个地区都有一套自己的秩序。杨成教授提到，从“多极化”这个国际政治术语表述的变化中可以看到世界格局向多地区、多秩序方向转变的趋势。比如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在其官方文件中开始用“多中心世界”来代替“多极化”的表述，因为在俄罗斯看来，“多极化”容易让人联想到 19 世纪时的欧洲均势与大国协调，含有零和博弈与激烈竞争的意味，“多中心世界”的表述则比较温和，但又能显示俄罗斯在自己所在地区的中心地位。

杨成教授认为，除了地区转向外，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另一个趋势是大国竞争的回归。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大国竞争的零和性正在上升，例如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战，以及近期中美国围绕新冠疫情展开的博弈等。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大国竞争的回归可称为“卡尔时刻”（爱德华·卡尔是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大国必有一战”的零和博弈逻辑仍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中发挥着作用，大国政治的悲剧确实实地存在于国际政治当中。

杨成教授认为，大国竞争的回归给小国提供了选边站队或是平衡外交的机会，大国政治的悲剧带来的可能是小国政治的喜剧。这与冷战时期的大国竞争有所不同，因为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之下，只存在苏联与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小国要么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跟随苏联，要么加入资本主义阵营跟随

美国，小国自身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且自身的利益往往会被美苏两国所牺牲。但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由于相互竞争的地区大国数量的增多，小国因此有了更多的选择，以及更大的外交活动空间，从而为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可能。

杨成教授指出，当前的中亚地区已经出现了因大国竞争所带来的小国活动空间扩大的现象，中亚小国正迎来自己的政治喜剧。从实证角度看，吉尔吉斯斯坦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作为一个人口不到 700 万的小国，吉尔吉斯斯坦“左右逢源”，中美俄等大国争相向其提供各类援助。2001 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美国租用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空军基地用于转运士兵和军用物资，美军使用基地期间需要消耗大量的航空燃油，于是从阿卡耶夫到巴基耶夫，再到奥通巴耶娃，连续三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都授意自己的亲信成立皮包公司，低价从俄罗斯石油公司购进航空燃油，再高价卖给美国人，从中赚取巨额剪刀差价。美军花了许多钱从吉尔吉斯斯坦购买航空燃油，却仍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这笔花费是值得的，为吉尔吉斯斯坦作辩护。这个案例说明，在大国有求于小国时，小国可以利用自身的地缘位置等条件，向大国提高要价，开展多向度外交，在大国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外交主动权，获得更大的利益空间。

二、身份认同问题

杨成教授认为，在当今国际政治领域中，认同政治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而在中亚地区，认同政治除了包含身份认同的问题外，还涉及承认政治。每个中亚国家都在

想方设法地凸显自己的主体性，追求一定的国际地位。比如哈萨克斯坦，其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执政期间提出过许多国际倡议，其目的就在于为哈萨克斯坦追求一定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一般来说，小国不具备追求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的实力，但是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相较于其他三个小国来说，可以算是地区大国，因此它们倾向于追求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来凸显自己在中亚地区政治中的重要性。

作为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中亚五国都面临着民族构建、国家构建和地区构建三个关键任务，因此它们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非常敏感。杨成教授提到，2014年时，普京曾无意说到，“纳扎尔巴耶夫在一个从来没有存在国家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结果这句本是称赞纳扎尔巴耶夫的话却把纳氏激怒了，也刺激了哈萨克斯坦敏感的民族心理，招致了哈萨克斯坦的强烈抗议。杨成教授认为，中亚国家之所以对身份认同问题非常敏感，是因为它们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还太短，它们在独立后非常害怕重新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因此它们积极追求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渴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为了凸显独立性与主体性，哈萨克斯坦还在2017年专门举办了纪念哈萨克汗国建立550周年的国家庆典。庆典主办方邀请了许多国际学者与媒体代表参加，但为了凸显其民族性，主办方坚持使用哈萨克语发言，而且并没有向国外代表提供同传服务，甚至俄罗斯族代表也是用60%的哈萨克语和40%的俄语进行发言。杨成教授也参加了此次庆典，他在

发言的开头、中间与结尾部分使用了哈萨克语，赢得了主办方的好感，在随后的宴会中受到了哈萨克斯坦政府高级官员的接见。该官员对杨成教授所在学校的“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名称不满（认为只强调了俄罗斯），并建议改成“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与中亚研究中心”，一方面强调哈萨克斯坦相对于俄罗斯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能够将哈萨克斯坦与其他中亚四国区别开来，突出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杨成教授指出，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哈萨克斯坦对于自己身份认同问题的敏感性和对自己所在地区的国际影响力的追求。

杨成教授认为，对于中亚国家来说，民族构建、国家构建和地区构建组成了认同政治领域的不可兼顾的三角任务。实际上，独立以后，中亚国家都是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到了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任务上，如重新书写各自的民族历史、强化本民族的语言教育、重新树立各自民族的英雄崇拜，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去除俄罗斯的历史痕迹等，努力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树立好民众对于各自民族、各自国家的身份认同。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亚五国的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的任务才基本完成。为什么民族构建、国家构建优先于地区构建？因为这两者能够确保自己国家的生存，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成员，并且有助于突出自己是独立的一员，因此自然拥有优先权。

三、中亚地区构建的尝试

从历史轨迹看，直到独立两年后，中亚国家才进行了地区构建的首次尝试。1993年2月，乌兹别克斯坦时任总统卡里莫夫邀请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前往塔什干，

商讨中亚地区构建与经济合作的问题，但是此时各国的工作重心都还在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的问题上，因此中亚首次地区构建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亚国家进行了第二次地区构建的尝试，希望建立具备地区一体化性质的中亚同盟，但是因为俄罗斯的干预也很快失败了。杨成教授认为，作为地区重要的“内部他者”，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拥有重要的国家利益，而且俄罗斯始终把中亚地区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把中亚国家看作自己的战略后院和战略缓冲地带，因此俄罗斯不希望中亚国家搞独立的地区一体化建设。此外，相较于中国、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土耳其这些“外部他者”，俄罗斯对于中亚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内部他者”：鉴于沙俄和苏联时期的共同历史，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仍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俄罗斯对于中亚国家还有巨大的影响力，中亚国家也更亲近俄罗斯，没有将俄罗斯视为完全的“外部他者”，而是与俄罗斯保持着特殊的联系。

杨成教授指出，俄罗斯对于中亚的影响力广泛分布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特别是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俄罗斯具有其他大国所无法比拟的巨大影响力：俄语依然是整个中亚地区通用的语言系统，中亚各国的新闻传媒基本受到俄罗斯的控制，中亚的教育体系仍保留着俄罗斯式的特点。虽然中亚各国都在推行去俄罗斯化的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比如乌兹别克斯坦想要推行乌兹别克语的拉丁化，但是当前取得的效果却是乌兹别克人一半用拉丁字母，一半还用基里尔字母进行书写。哈萨克斯坦为了去俄罗斯化也有类似的计划，在强调哈萨克语的基础上，鼓励多

语种教育，积极开展英语教育。这表明这些国家已经在寻求一种替代性的所谓的认同政治供给方，已不再是俄罗斯单独一家了，其他的大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也在发生着作用。但也应该看到，尽管俄罗斯的实力在下降，其影响力也在下降，给地区构建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同时这些国家也有意识这样去做，但它们在做事的时候仍会遇到来自俄罗斯干预的巨大阻力。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亚国家尝试建立一体化的中亚同盟，但是俄罗斯很快就进行了干预，并最终将中亚同盟合并到自己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之中，这说明俄罗斯依然在中亚拥有左右地区秩序的影响力，俄罗斯依然是中亚地区认同政治中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他者力量”。

杨成教授提到，近年来中亚国家构建独立的地区一体化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并且得到了西方国家的鼓励和支持。有意思的是，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也在积极促进中亚地区的一体化。2015 年，刚刚卸任的新加坡外交部常任秘书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首次提出，希望中亚国家仿效东盟的结构，完全由小国组成的联合体，在大国之间起到联系作用的同时，在国际事务上也发挥着更多的作用。这一建议当时引发了中亚各国的浓厚兴趣。

2016 年 9 月，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逝世，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台为第三次中亚地区构建提供了契机。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改卡里莫夫时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强势推进第三次中亚地区构建。米尔济约耶夫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

本解决了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个邻国间存在了 20 余年的边境纠纷问题，从而为中亚地区一体化构建扫除了大的内部障碍。2018 年 3 月，首次中亚国家领导人工作会晤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经贸合作、水资源利用、地区安全、文化交流等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并达成一致意见。

此次中亚国家吸取了历史上的失败教训，在对外宣传上采取了非常低调、非常谨慎的说法，不再提“同盟”、“一体化”等字眼。与此同时，中亚国家自身对于“一体化”的字眼也高度敏感，因为一体化意味着一定程度的主权让渡，即使是对换了新总统的乌兹别克斯坦来说，其在积极推进中亚地区构建时也更愿意用“地区合作”来代替“一体化”的表述。杨成教授提到，在 2017 年阿斯塔纳俱乐部会议上，时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直属的战略与地区间合作研究所所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现为上合组织秘书长）就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中亚国家不希望用“一体化”来表述当前的地区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土库曼斯坦总统并没有参加首次中亚国家领导人工作会晤，而是委派该国议长努尔别尔德耶娃出席。作为联合国认可的永久中立国，土库曼斯坦对于涉及地区构建的国际合作机制的态度基本上持不积极态度。

中亚的地区构建为什么如此艰难，除了俄罗斯的干扰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杨成教授认为，当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区一体化合作机制都是以欧盟为样本，学习欧盟的地区构建模式，例如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为什么学习欧盟？因为欧盟的地区构建最为成功。欧洲之父让·莫内

曾经说过，欧共体伟大的地方不是创造了一个超国家行为体，而是提供了一种让国与国、人和人之间可以和平共处，可以共同建设地区的方法。但是欧盟的样本并不适合中亚，因为欧洲的一体化是以主权国家为起点的，欧盟形成的过程中不存在所谓的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等问题，其一体化程度是由低到高，逐步上升的过程，最终实现了高度的地区一体化合作。但是中亚不同，在苏联时期，中亚各加盟共和国都是高度统一于苏联单一的计划经济体系之下的，也就是说，中亚原本就是高度一体化的地区，但是苏联的解体使得它们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原先的一体化机制变得支离破碎，因此中亚国家在独立后必须先完成民族与国家的构建任务，才能在主权国家的起点上重新开始地区一体化的合作。杨成教授认为，与欧盟相比，中亚地区一体化合作的程度应该呈现出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的“U”字形结构，然而独立 20 余年来，中亚的地区一体化合作只经历了程度由高到低的过程，新的上升期还没有出现，因此设想的“U”字形结构在当前变成了一个“L”字形结构，这也是为什么原先并不存在的水资源利用、交通铁路运输等问题在中亚各国独立后日益凸显的原因。德国的一名学者将欧盟的地区一体化模式命名为“聚合式一体化”（Polymerization Integration），将中亚的地区一体化模式命名为“维系式一体化”（Maintenance Integration）。在杨成教授看来，另一种由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模式可以命名为“捆绑式一体化”（Binding Integration）。他认为，当前的中亚国家基本都完成了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任务，因此在新的起点上，中

亚第三次地区构建的尝试有可能取得较大的进展。

此外，杨成教授认为，中亚国家重视第三次地区构建的一个原因是为了矫正以往过度强调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所带来的问题与错误。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过去 20 余年来过度强调民族构建的一个结果是民众身份认同的碎片化，许多民众开始用哈萨克族历史上存在的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的划分作为自己身份认同的依据，甚至还有许多年轻人强调自己所属的各个玉兹之下的部落身份认同，长此以往，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后果将是哈萨克斯坦社会的撕裂与国家的分裂。同时，哈萨克斯坦在过度强调自身民族性与历史性的过程中迎来了伊斯兰教的复兴，一些落后的民族陋习与宗教陋习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欠发达地区死灰复燃，对哈萨克斯坦的世俗化政策产生了冲击。因此，纳扎尔巴耶夫在 2017 年时提出了“第三次现代化倡议”，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动中亚的地区构建，促进中亚的地区合作以消除过度强调民族构建、地区构建所产生的问题和弊端。

另一个原因则源自于中亚国家在大国林立的国际环境中保护自己的外部政治需求。在大国环伺的国际环境中，小国的战略选择无非两种：一种是追随大国战略，寻求与某一大国结盟，获得该大国的保护；另一种则是与其他小国一起联合自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中亚国家虽然与俄罗斯的关系比较特殊，但并不是真正的盟友关系，相反中亚国家都不愿依附于某一大国，而是在中美俄三大国竞争的国际环境中采取多元平衡的外交战略，但是这样仍不足以充分保证自身安全，因此中亚国家还需要选择联合自强的战略。由此，未来

中亚国家联合自强的道路可能会更接近于东盟模式，即通过抱团成为一个整体来与大国互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杨成教授认为，未来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中亚地区对中国来说将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其中最大的好处是在经贸交往中不再需要与单独的某个国家进行双边谈判，只要能进入一国市场就相当于进入了整个中亚市场，从而大大降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生产经营的成本。因此，中国对于中亚的地区构建应该保持一个相对超脱的态度，不干预、不阻碍中亚内部的地区合作。

四、中亚国家对于中国的认知转型

在分析了中亚地区构建对于中国的影响后，杨成教授谈了中亚国家对于中国的认知转型问题。他认为，自苏联解体以来的将近 30 年的时间里，中亚国家对于中国的认知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变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阶段，中亚国家的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较为负面，因为 90 年代是中亚物资短缺的时期，许多中国商人曾运送大量廉价但质量低劣的商品前往中亚销售，给中亚民众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因此，在 90 年代的中亚民众的认知中，中国就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只要有条件，都不会选择购买中国商品。此后，随着上海五国机制的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逐步规范化，中国向中亚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也越来越优质，中亚国家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开始改观。进入 21 世纪后，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中亚国家民众基于廉价商品所形成的中国刻板印象也得到了改变，

逐步确立了关于中国的大国形象认知。2013年9月，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后，中亚国家对于中国认知发生了第三阶段性的变化。它们一方面希望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实力的担忧也在上升，因为此时的中国对于中亚国家来说已是一个体量巨大的邻国，他们担心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会把他们的市场、产业链冲垮。其实，这种担忧早在21世纪初中亚国家接连否决中国提出的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内部自贸区与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倡议时就有所体现。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后，在西方媒体与部分俄罗斯媒体的负面宣传下，中亚国家加深了对于中国威胁论的认知，防范中国的意识也有所提高。

目前，除土库曼斯坦外，其余中亚四国都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合作组织的问题上，杨成教授认为，“负面清单”式的合作规定与协商一致的组织原则严重制约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效能与发展，因为上合组织只规定了成员国不能做什么，却没有规定可以做什么，所以各成员国在具体的合作问题上分歧较大。并且，协商一致的原则又相当于赋予了各成员国“一票否决权”，所以在很多合作问题上上合组织都因受制于此两项规定而无法取得成效。在中亚四国+俄罗斯都难以取得合作成效的情况下，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的结果只会让上合组织越来越虚，越来越缺乏行动力。

最后，杨成教授认为，新疆问题也是影响中亚国家认知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近些年来，新疆问题的变化对中亚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由于缺乏对中国新疆政策的

了解，在西方媒体及部分俄罗斯媒体的抹黑下，中亚国家接收到的都是关于新疆问题的扭曲和负面信息，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它们对于中国的误解，增长了它们对于中国的不信任感。

杨成教授指出，由于接收到的是扭曲和负面信息，从官方层面到社会层面，中亚对于中国认知都存在错误：中国越强大，中亚国家就越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附庸。此外，“中国威胁论”在中亚国家中拥有广泛的信众，因此，中国必须做好对于中亚国家的外宣工作。要做好外宣工作首先要做好跨文化交流，中国应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中亚文化，理解它们的所思所想，在对外宣传中不能只强调自己的国力、影响力有多么强大，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中国应站在中亚国家的角度来讲好中国故事，既要掌握好讲故事的技巧，又要有好的中国故事可讲，其中好的中国故事更为关键。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最好的故事，因为它是关于中国是如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强国，每个中国人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实现自己的“中国梦”的故事。如何向中亚国家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改变中亚国家对于中国的错误认知，是今后中国在对外宣传上需要努力的方向。

发言结束后，杨成教授与参加活动的师生就中亚历史、土库曼斯坦与中亚地区合作、哈萨克斯坦的民族政策、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地区合作、中亚的海外分校与国际教育、俄罗斯与中亚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宁琦教授在对本期沙龙进行总结时表示，在场的同学之所以学习跨文化交流这门课程，是为未来对中亚以及相关研究的国家进行田野调查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通过杨成老师

的讲述，我们能够从不同角度，看到除大国博弈外的小国行为逻辑研究，这对我们进行田野调查和国别和区域研究非常重要。希望今后有机会再邀请杨成老师就小国行为逻辑的个案分析进行讲座，把中亚每个国家“剖开”进行细致研究。